



钢铁乐章(国画) 刘震力

大家小品

清明时节遥祭杜甫

马新朝

五四运动对旧文化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面积破坏后，基本没有建立；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悄然进入中国，这本来是西方的一个学术流派，在西方也多有争议，然而，在“唯新是好”的中国，不是积极地吸收其精华，而是在没有完全消化的情况下全然接收，并奉为时髦，先锋，竞相仿效之，从而又变成了一场没有声音的革命。后现代的主旨是无中心论，消解主体，消解神圣，消解传统，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得更彻底。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不是战争就是革命，而战争也是革命，革命的情结已经流淌在国人的血液中，成为生命中的无意识和习惯性思维模式。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温柔敦厚等传统品质荡然无存。即使在和平的岁月里，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也都喜欢使用革命的思维模式，而革命就是暴力。最近互联网上恶搞杜甫的事件就是一种语言暴力。

愚以为：恶搞一词用在孩子们那里，只是一种戏谑罢了。但到了大人们那里这个词就变得重了，因为大人们多精于世故或私利，于是恶搞就成了真正的恶搞，成了语言暴力的代名词。恶搞在大人们那里就是歇斯底里，就是没有边界，没有底线，就是目空一切，没有任何敬畏感。一个人若没有了敬畏感，就变得可怕了，他什么事不敢干？

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悬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一道精神光芒，照耀后人。他是一位世界的文化巨人，已经成为我们古老传统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你写诗不写诗，血管里都有着杜甫的影子。在清明节之际，国人们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和纪念。而是以一种恶搞他的形式出现，这多少有点滑稽和悲哀。有外国人不解地问，拿自己民族的文化伟人开涮，中国人这是怎么了？有论者写文章引用美国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的话：我愿拿出我所拥有的一切技术，换取一个与苏格拉底共处的下午。可惜，中国恐怕没有这样的老板了。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只有权力、金钱、美色。在恶搞者的眼中，视文化名人如草芥，那么普通人在他们那里简直就是粪土了。

当我看到杜甫苍老着脸，时而被戏谑，时而被暴力被色情，时而被光着下身随地尿尿，时而蹲在便池上玩手机，时而怀抱美女，时而搞搞同性恋，时而被房地商弄去做广告时，我茫然了。近来又听说，此事由一帮商人策划推波助澜，后来发展成为群体性恶搞事件。利用贬损杜甫挣钱，这钱真黑。昨天，我独自来到巩义的杜甫墓地，面对着他“穷年忧黎元”的雕像，潸然泪下。有网友引用郁达夫纪念鲁迅时说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当你在戏谑杜甫的同时，自己就变矮了。

如果是孩子们学习累了，在课本上涂鸦，弄些小情趣，玩玩也就罢了，无可指责。问题出在大人们身上，是这些大人们对孩子不加以引导和教育，反而跟着起哄，并群起效之，真是不应该。我们这些大人们，大人们，有文化的大人们，没有文化的大人们，甚至学者大人们，官员大人们，媒体大人们或麻木而随波逐流；或被网络暴力吓昏了头，怕引火烧身，于是赶紧表态要宽容再宽容；更有文化人和媒体合谋表示赞赏和支持恶搞。一个泱泱大国，学者众多，研究者众多，电视和报纸的评论员众多，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对这个本来简单的事件反而糊涂起来。有不少主流媒体也对恶搞赞赏有加，认为恶搞是“网络狂欢”，只是一种娱乐而已，呵护有加。

2012年3月26日中午，我对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杜甫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光，我们决不允许诋毁杜甫形象。现在是娱乐时代，网友涂鸦诗圣杜甫画像，也可能没有恶意。如果网友恶搞他，是非常不应该的。恶搞文化、穿越文化不能没有民族底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等等。不想这段言论发表后，在网络、报纸、电视上受了众多质疑、讽刺、挖苦、谩骂甚至威胁。”

也有支持我的网友说：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恶搞诗人惠特曼；在英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恶搞莎士比亚；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听说过恶搞托尔斯泰、普希金。他们满怀敬意和尊重，把自己民族文化巨人的雕像矗立在城市里的公园和广场，并教育孩子们要敬仰和学习。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发祥地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出现围剿和恶搞自己民族的文化先贤的现象。这种群体性、民众性地恶搞杜甫，把杜甫作为玩物的事件在中国几千年来也是罕见的。试问，我们今天搞掉了杜甫，明天搞掉了鲁迅，后天又不知道要搞掉谁，这种文化无根和虚无主义倾向，到头来真是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杜甫是我们的文化祖先，恶搞祖先，戏谑祖先，就是挖祖坟。在清明节之际，你去挖祖坟，你何德之有？



撒哈拉中的净心院(国画) 孔凡平

现代诗坛

吕韦征的诗

想起
和同事一起逛商场。
在一个专柜前，衣襟把手臂
撑在半空——我
突然想起你。
想你就如同冬日阳光下
一团盛放的雪白棉花。
想你就如同想念我自己——
自己的眼睛，嘴角，喉结，小拇指，
指尖浅浅的疤……
我想起，也许你已忘记了我。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多么遗憾不能亲口向你诉说，此刻
这麦浪之上涌动的幸福，和
一只蚯蚓的悲感——
走下电梯，身边那么多人，
每一个，都不像你。
午后
阳光下，蝴蝶兰开得正好。

新书架

《在新疆》

邓楠

这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后的最新散文集，全书分为五辑，收入三十八篇散文。第一辑一片叶子下的生活；第二辑半路上的车库；第三辑树

的命运；第四辑月光；第五辑向梦学习。本书依然沿袭《一个人的村庄》的风格，文字淡雅、质朴，多对身边的人物、事，以他惯有的素淡明澈的语言进行抒写和描绘，平常人延续了几百年的生活状态，在刘亮程的笔下散发了熠熠的光彩。他笔下的新疆能够深刻地停留在每个读者的记忆中，让人向往。哲学思维与诗性智慧相交织，形成他散文中特有的深厚与诗美素质，读来无不令人撼动心扉。

我们继续警戒。五点、六点，时间慢慢蠕动着：这一夜好像没有尽头。终于，一条微弱的亮光在地平线出现，慢慢向平静的海面伸展。很快，海滩上的巨石和人影已经依稀可辨，一刻钟之后，天亮得足以开始搜索。

我们的士兵排成一列从海滩一端向另一端行进，在若明若暗的晨曦中，一寸一寸地搜查海滩、洞穴、坑坎和带刺的灌木丛。我和上尉走在队伍的后边。

我们搜查了这片地方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一无所获，连范·德·克彭的影子都没有。

我喊一声“立定”，叫士兵们回来。来到我们跟前，原来的队形已经有些散乱，但仍警惕地注视着海滩。真奇怪，范·德·克彭应该在海滩上呀！莫非看到同伴被捕他游回船上去了？这不可能！除了海浪在松软的海滩上发出单调的声音之外，没有听到任何人下水的声音。

我很恼火，紧握双拳，看了士兵们一眼。天已经亮得能认出来人。我从排头看到排尾，又从排尾看到排头。突然，问题解决了，我不由自主地高声笑起来。

“好狡猾的家伙！”我说。上尉惊讶地看着我问：“怎么啦？”

“好狡猾的家伙！”我提高嗓门重复说，“你们，士兵们，原地立定！”全体站好，我转向排尾说：“请你过来，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

我和上尉向士兵们走去，在每个人面前都停下来端详一下。八个、九个、十个，我们几乎来到队尾。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我停下来，把手放在最后一个人的肩上：“你好，范·德·克彭。”他是第十三个人。

事情已经清楚，他利用当时黑暗中的混乱，插到我们的士兵当中。如果我们停止搜查，他会留在后边，等汽车一走，就伏到一个地方隐藏起来。真是个顽固而又诡计多端的家伙！

他之所以被抓获，只是由于搜

捕者当中有一个人迷信。

平安到达

从1940年6月到1944年6月6日盟军反攻，英国一直与欧洲大陆隔绝。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男女穿过德国封锁线，越过海峡，到达较为安全的英国。有人是为逃命而来，因为由于种族或政治思想的原因，一旦盖世太保抓到就会被判刑；还有一些人是受到欺凌心怀不满，等待时机报仇雪恨的爱国青年，他们准备在英国组织抵抗；另一些人是在敦刻尔克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和其他英国军事人员。

还有一些则是混在难民当中的德国情报机构的特务。

一天下午，我刚刚从总部回到办公室，一名助手焦急地对我说：“你可回来了。有急事等你。”“又是什么事呀？”我问。

“两个法国人驾机在西萨塞克斯降落。”

“噢。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欧洲大陆的飞机有几千架呢！”

“这架可不一样，”他做了个鬼脸说，“报告上说是他们自己造的飞机！”

“大概他们是莱特兄弟吧。可惜他们早已不在人世，况且也不是法国人。那好吧，你带我去看看这两位勇敢的飞行员。”

“他们乘汽车来，还没有到，大概一小时之内会到的。”

不一会儿，两个人被押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同他们简单谈了一下。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身材瘦削，外表和善，浓密的黑发，蓄有当时有名的罗德德·科尔曼式的唇髭，长得与那个电影明星有几分相像。他同我握手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想起他的名字属于法国一个古老家族，承袭子爵封号。另一个入岁数要比他大一倍，褐色皮肤，仪表大不相同：个子矮小，身体粗壮，像个地道的农民。他叫马尔赛尔，是子爵的汽车司机，对子爵毕恭毕敬，总是站在子爵后边两步远的地方。每当子爵对他讲话，他总要把头微微低下。

请他们坐下之后，我犹豫片刻，首先问了子爵后面的马尔赛尔回答问题。我同他诸如姓名、住址、宗教信仰、政治思想、所受教育、他父亲的情况等必要的问题之后，就向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当然，这个问题只有子爵才有资格回答，马尔赛尔毕恭毕敬地在后面听着。

连载

恰有弟弟杜观来书，言及家乡战乱已平，并于洛安下住所。杜甫欢喜异常，急着已成人的宗文先行归乡安顿，而后，舍下夔州房舍、田地、果园及所有的一切，不顾柏茂琳的百般劝阻，携妻家人，泛舟江上。扁舟沿江随波逐流，已抵至江陵。

杜甫携家人上岸入城，前去投奔时任荆南节度使幕府行军司马杜位。杜位乃杜甫族弟，昔年于李林甫偃月楼奏事，为其女六凤所喜，人赞府为婿。奸相李林甫病故之后，杨国忠将李林甫生前罪状罗列数十款，款款皆是死罪。唐玄宗震怒，遂下旨查抄李家，褫去李林甫生前所有封号，又掘其尸骨，去其口，抛于荒野。子婿皆被流放，杜位亦是“攀龙忽坠天”，由朝中右拾阙不断贬斥，先至岭南，后至蜀地，再贬江陵。历世事无情变故，杜位见杜甫前来，心底陡然产生一缕柔情。就这样一缕如丝温情，使此时无路可去的杜甫再次止下漂泊的脚步。

商州兵变消息传来，杜甫心中自襄阳经南阳返洛阳的归乡之路，已经断绝。杜甫于此痛定思痛，陡然之间，竟又产生归京为官的念头，欲以残力，报效朝廷。古代文人苦读诗书，若不为君王所用，无疑于作茧自缚！只有为官一途，方能通过君王将自己的主张行之于世。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杜甫再闻故土难平，豪气陡升，作《江汉》一诗述之：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然而，京门万里，宫阙九重，杜甫漂泊于江湖之远，焉有归路？只好羁留江陵，望江浩叹！江陵故人稀。杜甫昔年旧交李之芳为江陵尚书，郑审为江陵少尹。荆南节度使卫伯玉亦好诗文，知其前来，恰值荆南新楼初成，遂邀杜甫为新楼赋诗。杜甫一赋再赋，忍受着内心“苦逼求食”的巨大苦痛，面带微笑作着“常曝眼恩”之诗文。“自兵家之客，冥心若死灰”的杜甫在江陵活着！然而，活得如此不羁：“饥餐家家米，愁饮处处杯。”曾因其老迈，已无点缀之相；天下战乱之际，诗文无非乃眼前飞行、水中珠流而已！

唯有荆南直王即王即杜甫诗文中，时常携酒探望。其人忠直，与杜甫念及朝中朋比为奸、贪

婪成风、方镇割据自立、专横暴政之困事，无不涕泪愤慨，仗剑狂呼。杜甫有《短歌行》诗与其唱和。此诗别具一格，虽竟尽讽刺嘲弄于已之语，却对怀才不遇的王郎充满期待！深沉苍劲，痛快淋漓，似是衰朽之音，却更似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绝唱！令人读后百味于心，屡屡于含笑之中落下凄怆之泪。

未几，李之芳病殒江陵，杜甫再次发出失友已孤、怀友伤己之悲叹！秋冬之时，江边恰有一只孤鸟病弱呻吟着，踉跄飞过江面。杜甫不由心思震颤：自己亦是一只苍老病弱！昔年“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英雄之气，荡然无存，只有空怀壮志，无力呻吟！已是衰朽无力的杜甫如今日暮途穷，壮志难酬，空怀余恨！

杜甫流寓江陵，去止不定。落寞困顿，百无聊赖。有《暮归》一诗可见其心。诗中有云：“南渡桂生一凄凄。就这一缕如丝温情，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在江陵留滞日久，昔日故人照顾亦是有限，杜甫深感乱世之下，人心不古，世态炎凉。急于离去，却不知何去。

杜甫一路悲歌，漂过公安、石首、监利等地，偶有停泊，时有吟诵。岁末之时，舟至岳阳。杜甫又为眼前浩渺动荡的洞庭湖水触动家国之忧、身世之慨，千古绝唱《登岳阳楼》浩然而出：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第十三章 辗转漂泊日途穷 身在异地魂归乡

杜甫须发蓬乱，满怀愁绪抵达衡州时，才知韦之晋已于三月间改任潭州刺史。只好沿湘江撑船而回，在潭州与韦之晋相遇。见时交至杜甫前来，已至暮年的韦之晋感慨万端。二人相对无言，涕泪交流。杜甫早年游历陕西之时，与韦之晋、寇锡交游。其人以道自处，行成乎身，言合情理，文多雅兴。以润政，深受儒教浸染；忠而有清，均感德而愧。为湖南观察使时，因赋役而恤。为湖南观察使时，朝廷任其德贤，特加御史大夫，任潭州刺史。韦之晋深情款待杜甫，并安置杜甫家人暂栖公馆。

怀念龚柯

吴宁豫

我的恩师龚柯逝世一周年了，作为学生彻夜难眠，对恩师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

龚柯老师是中国山水画大师，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酷爱书画艺术，中学时代受业于中国水彩画开山大师李剑晨先生，为终生献身绘画事业奠定了根基。1936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恭列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汪采白、王雪涛、常书鸿等诸大师门墙，刻苦研摹唐、宋、元、明及当代诸名家迹，融会贯通，绘事大进。1942年，龚老随中国著名油画大师常书鸿先生赴敦煌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潜心研究石窟壁画艺术，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意旨和创作风格。后应国画大师潘天寿之邀，赴重庆国立艺专任讲师。建国后，龚老师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及主持美协事务，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深入生活，用手中的画笔讴歌时代，刻画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劳动人民的鲜活形象，为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5年离休后，龚老师以古稀高龄遍游大江南北，大自然的壮丽，激发了龚柯老师强烈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这个时期的创作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

龚老的山水画作品重神韵，求意境，透灵气，非常讲究运笔和墨法，苍厚古朴，刚柔相济，润而不腻。作品布局取舍得当，构图完整，实处求虚，虚处有实，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法则，又能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传统笔墨的干湿、苍润、虚实、隐显、聚散、呼应以及渲染的变化，都恰到好处地融会在他的作品里。

龚柯老师一生勤奋，以近百岁的高龄，仍每天坚持作画。龚老师自己生活节俭，经常参加慈善公益活动，济困扶贫、赈灾助学。因为站着作画时间太长，每次回到家中都疲惫不堪，腰酸腿疼，但是只要一听到有慈善活动，他匆匆在腰上贴上膏药就欣然前往，而这些事情他却从来不对外人说起。

我仰慕龚老的才华，有幸拜入龚老门下，获益良多。每次上课老师手把手教我，耐心指导，循循善诱，我的每一幅习作他都认真检查修改，指出我的优点和不足。有一次我去老师家上课，正赶上下雪，我手冻得通红，老师问我：这么冷的天怎么没戴手套。我随口答道：前天丢了，还没来得及买。等隔了一天我再去老师家上课时，他拿出一副崭新的皮手套送给我，我当时心里倍感温暖，刻骨铭心。

学习绘画的人，笔墨纸砚用得得多，龚老经常把他的优质画纸和画笔送给我，鼓励我多多练习绘画；老师对我很提携，但凡省内外邀请他参加的画展笔会，他都会带着我，给我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引荐知名书画家为我辅导指点。

值此龚柯老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想对老人家说一声：“谢谢您，恩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郟邑旧事

郑州最早的消防队

杜丰芮 王瑞明

清朝末年，随着京汉、陇海铁路通车，中国两大铁路干线在郑州交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四面八方的旅客和货物，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商业区和居民区相对集中在火车站周围，而且房屋木结构、棚棚式的建筑及纸糊门窗占多数，因此最怕失火。

民国初，郑州的消防组织最初叫做“水会”。它是民间商办的消防团体。水会的成员则由商铺的学徒和一些小商贩组成。平时各务本业，一旦火警发生，临时由水会召集，穿上特制的“号衣”，赶到现场救火。有的居民看到火警，也纷纷赶到火场协助救火。火灭后凭着号衣去领救火费，居民群众参与是无薪酬的。当年水会的消防设备十分简陋，除了挠钩、水桶之类的工具，别无他物，再加上城市根本没有消防用的水路，只能依靠就近的水井提水往外传。因此，一遇大火，水会也无能为力，只能任其焚烧。民国5年(1916年)11月9日，《河声日报》曾刊载郟县消息：“车站对面的宏衣里(现大同路西口路东)发生一场大火，火势猛烈烧毁了一座蔗糖戏园和附近民居，店铺50多间。造成附近所有商铺停业多日。车站下沿精华尽在此地，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火灾，一日而尽。为从来未有的消息”。可见这场大火之甚，当时的水会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民国6年(1917年)7月，郟县商务会和汴洛铁路稽查公所共同商议，让各铺户每月按生意大小，筹捐款额。组织警务消防队，专事灭火。同年10月在南川里(后改为南乔家门)路西15号，联合招募队员，经过测试挑选，汴洛铁路郟县消防队招收30名，郟县消防队招募50名，并从开封、天津聘人教火车操作技术。

当年的消防队设备极其简单，仅有一部人推水压机，其余就是挠钩、斧、锯、水桶等，由于没有消防用的水路，只能依靠附近的水井。一旦火警发生，利用人力将水桶里的水压出。有段时间，消防队还领着商家店铺门前随时储存一桶消防水备用。

郑州随着市场的繁荣，人口增多，火警也多了。1920年以后，消防队为观察火情，开始在小西门南拐角城墙最高点建了一个“望火台”，专设几名消防队员值班，当时郑州没有高大建筑物和楼房，登高望远，对及时发现火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直沿用了解放初。



程韬光 著